



懷仁之驛

半年刊

魯汶南懷仁基金會 • Vlamingenstraat 1 • B-3000 Leuven

2025 年 6 月 • 第 37 期

內容摘要

中国教会与南怀仁基金会，一起悼念一位挚友的离世1

社论2

南怀仁基金会董事会

第一部分：培育地方华人教会牧灵人员：面向中国、台湾及东南亚的本地教会3

鲁汶：2025 年第七届春季牧灵进修班4

玛竇

台北举办“范古讲古聊天”课程，与第七届对话灵修工作坊6

林怡君

第二部分：南怀仁基金会将与本地华人教会一起庆祝百年庆典（1926-2026）7

刚恒毅枢机与主徒会10

编辑组

第三部分：圣母圣心会在华践行信仰本地化12

编辑组

中国本地化历史13

40 年前鲁汶大学校长 De Somer 开启了一项大胆且历史性举措20

在华出版的一部新专著：

《比利时来华圣母圣心会及其荷语汉学家闵宣化研究》22

郑永君

缅怀鲁保禄（Paul Rule）教授23

Gianni Crivel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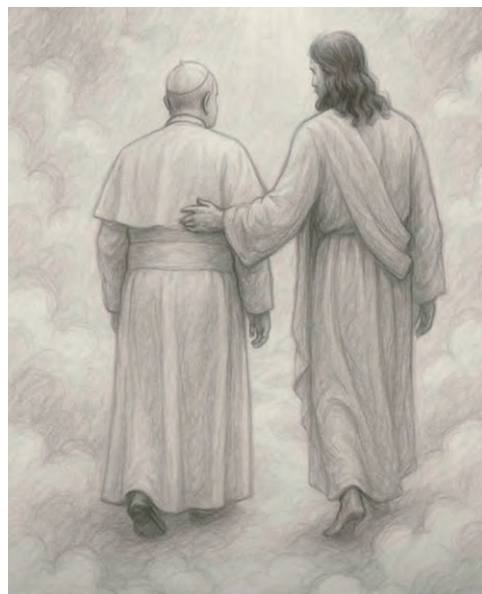
图片报道24

南怀仁基金会使命宣言26

了解并支持南怀仁基金会的中国计划28

中国教会与南怀仁基金会，一起悼念一位挚友的离世

自 2015 年起，每年中国神父在鲁汶参加进修班后，都会前往罗马朝圣，并受到教宗方济各的亲切接见。2018 年，教宗方济各签署了一项协议，开启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这一举措延续了教宗保禄六世开启的对话之路。早在 1970 年，保禄六世便呼吁国际社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保禄六世的继任者——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延续了



复活后的两位朋友回归天乡（插图摘自 St Mary's Scholasticate - OMI Australia [Facebookpage]. Retrieved 24 April 2025.

了他的方针，一直寻求与中国对话。而方济各教宗签署的协议，将中梵关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推向了高峰。然而，在方济各教宗去世后，很多纪念活动却忽视或低估了这一成就的历史意义。中国的基督徒与南怀仁基金会一同，悼念这位中国伟大朋友的离世。



2024 年春季班神父親見教宗

我们继续与中国以及全球华人团体对话！

应董事会特别邀请，本期社论由南怀仁基金会编辑组撰写。很少读者知道，多年来我们日复一日地筹备并指导南怀仁基金会内容丰富的活动计划。我们为大陆的神父、修会人士及平信徒组织培育课程。我们陪同中国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以及中国政府官员访问比利时及罗马。

今年，南怀仁基金会组织春季和夏季活动，带领荷兰华人平信徒前往罗马朝圣以庆祝禧年。我们将接待上海宗教局的代表团和北京教区的教理老师。2025年9月下旬，中国主教代表团将访问南怀仁基金会。应中国主教团邀请，南怀仁基金会代表团将于2025年底回访中国。我们组织比利时、荷兰友人一起参访圣母圣心会以前在中国的传教区，并与中国教友会面。

我们与鲁汶大学合作，共同研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华的丰富历史以及他们在发展、教育、医疗、语言研究等领域的贡献。相关研究成果，南怀仁基金会已经以中英文出版了60多卷系列丛书。我们亦发行《懷仁之驛》，以荷兰语、法语、英语及中文四语刊行。上述工作均由南怀仁基金会资助。简言之，我们每天都在竭尽全力维持此传承，而其乐无穷。我们为此深感自豪，并对多年来与比利时、荷兰友人日益深厚的理解与情谊心怀感激。

然而，最近，我们的基金会却意外地陷入了危机。作为基金会的员工，我们只能站在一旁沉默不语、无能为力，既忧心忡忡又深感不安。我们的许多读者也为此表示同情与支持，并纷纷表示他们与我们一样感到震惊。

幸运的是，我们的董事会能够迅速重组，使我们得以立即不受干扰且毫不犹豫地继续推进各种项目。尽管面临上述危机，我们仍确保基金会各项活动如过去40年一样持续开展。在南怀仁基金会创始人的支持下，我们共同延续这一美好事业。基金会永续长存，其精神与使命始终不变！我们会始终如一地秉持南怀仁基金会的宏伟事业，以及未来发展的坚定承诺，并持续与中国及全球华人基督徒团体对话交流。我们希望向《懷仁之驛》的所有读者明确的传递此信息，并向鼎力支持基金会的组织、合作伙伴致以崇高敬



南怀仁基金会仁义书苑成员（从左到右）：Simon Zheng, Teresa Hao, Lucia Wong, Matthew Gong, Clara Lin

意——特别感谢鲁汶大学对我们的活动给予的积极肯定和鼓励，自2006年起，我们在比利时教会指导下开展各种活动。尤其要感谢圣母圣心会，该修会于1983年创立本基金会，并邀请我们时至今日乃至未来，仍将与圣母圣心会携手，延续其创始人南怀义神父（Theophile Verbist）所确立的“中国优先”的传统方针。值此之际，我们欣然阐述今年的计划及已启动的相关工作成果。现将我们的工作划分为以下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培育本地华人教会的牧灵人员 — 服务中国、台湾及东南亚本地教会。

在本期《懷仁之驛》中，您将了解到基金会如何延续圣母圣心会神父们在华北地区开展的工作，通过组织、合办或协办培育教会牧灵人员，继续推进这一事工。

- 我们的课程以中文授课，直接服务于教会牧灵工作者：牧灵、教理（成人慕道）、教会社会伦理、灵修。中国神学院缺乏这些课程的教师及课程。

- 在本期中，来自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老师将简要介绍了这些课程的内容。

- 教会牧灵工作人员的培育是当今东西方地方教会的主要关注点。自 1982 年圣母圣心会成立南怀仁基金会以来，该基金会一直与中国的本地教会合作，致力于此领域的工作。

第二部分：本地华人教会百年庆典（1926-2026）：南怀仁基金会将与他们共同庆祝

- 直到 1926 年，首批中国籍主教才得以祝圣。这实际上标志着由中国籍主教领导的本地教会的诞生。早在 1946 年，教宗庇护十二便正式承认整个中国教会为“自治的本地教会”，拥有自己的主教、总主教、枢机及教宗顾问。然而时至今日，中国教会实现了相对成熟的自治本地教会，尤其是在现代世俗化社会中，若发展成为一个更具本地化的教会，对于中国教会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

- 此次百年纪念庆典，是彰显中国教会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时刻、内涵及历史意义的理想契机。本基金会选择暂不在鲁汶举办百年纪念活动，目前正在讨论大家的提议。基于历史背景考量，在东南亚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等，充满活力的天主教团体举办国际性庆典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本基金会愿为此提供协作支持。

- 梵蒂冈首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总主教，是 1926 年首批中国籍主教祝圣典礼的著名推动者，亦是中国天主教主徒会的创始人。该修会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广为人

知且蓬勃发展。鉴于此，本次庆典应特别关注主徒会及其创立者的历史角色——更何况 1926 至 2026 年亦适逢主徒会创会百年纪念。南怀仁基金会愿联合主办方，参与东南亚地区正在筹备的庆典活动。更多详情将于下期《懷仁之驛》刊载。

第三部分：圣母圣心会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和台湾推动信仰本地化

几个世纪以来，将基督宗教信仰融入中国文化始终是传教士面临的艰巨使命。我们发现圣母圣心会为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期《懷仁之驛》谨作简要介绍：

- 圣母圣心会神父在修会 7 年期间学习中文。燕鼐思神父（Joseph Jennes）教授他们中国教理讲授本地化历史。

- 1920-1945 年间，狄化淳神父（Leo Van Dijk）与方希圣神父（Mon Van Genechten）在基督宗教中国化艺术方面展开富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举措。

- 在台北，圣母圣心会进一步朝着此方向推动本地基督宗教艺术，包括成立“华明教理中心”、建立“台湾牧灵中心”和“华明艺廊”。

尊敬的读者：我们因您的关心与支持倍感鼓舞。您在本期《懷仁之驛》中读到的丰富活动纪闻，正印证了我们在比利时教会、鲁汶大学及圣母圣心会创立并资助基金会 23 年引领下，您的祈祷和友谊，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让我们一起携手为南怀仁基金会的美好未来共同努力。

南怀仁基金会董事会

第一部分 —— 培育地方华人教会牧灵人员：面向中国、台湾及东南亚的本地教会

南怀仁基金会再次为中国、台湾及东南亚地区地方教会的牧灵人员举办培育课程。此项工作源自当年圣心会神父在中国北方的传教事业，如今南怀仁基金会继续承办与推动。这些课程由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教师以中文授课。授课团队包括：龚玛竇神父（教授社会伦理），范凯令神父（Francis Carin，圣母爱子会，宗座继承人），林俊雄先生（沟通领域中的教理讲授，参考耶稣会 A. Fossion 神父的著作），黄财龙神父（赎世会，传教学），古伟瀛教授（中国教会史），以及陈方中教授（圣母圣心会在台湾的历史）

第一部分涵盖了在鲁汶和台北已经或即将进行的各项主题。课程期间还安排了文化交流活动，包括在鲁汶、德国、荷兰、罗马等地参访活动。

鲁汶——2025 年第七届春季牧灵进修班

仁义书苑院长：玛窦

自 2015 年起，南怀仁基金会每年为中国大陆的神父、修会会士及平信徒举办春季与夏季进修课程。该持续培育项目内容丰富，涵盖牧灵、教理讲授、成人慕道、天主教社会伦理、讲道学、人格成长、灵修、圣经，以及朝圣与访问等活动，皆为牧灵实践极具指导意义。

自新冠疫情结束后，南怀仁基金会即刻恢复了该培育项目，并于 2024 年 4 月成功举办了第六届牧灵进修班，广受好评。2025 年 8 月，基金会还将特别为修女举办一次夏季班。

在南怀仁基金会同仁克服重重困难与挑战的努力下，2025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30 日，中国 13 个教区、21 位堂区神父将参加鲁汶中国仁义书苑举办的，第七届春季牧灵进修班。

在第一周的课程中，介绍天主教社会伦理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基本原则、家庭、环境和工作等核心主题，帮助神父们深入了解天主教社会伦理在堂区牧灵工作中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社会服务与福传之间的联系。

在第二周的课程中，马来西亚的林俊雄先生讲授“沟通领域中的教理讲授”。林先生毕业于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获得神学学士，随后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取得牧灵伦理神学硕士，现为南怀仁基金会合作讲师。

本课程以耶稣会 André Fossion 神父所著《沟通领域中的教理讲授》为主要教材，引导神父们探讨并理解天主教信仰的核心内容，以及在当今社会中有效传递信仰的方式、态度与策略。课程结合教理讲授学与沟通的资料文献，带领神父们围绕传福音展开反思与讨论。

在不久的将来，林先生还将开设一门新课程，主题为“信仰与世俗社会的对话”，灵感来源于德凯瑟枢机（Jozef De Kesel）的著作。该课程旨在探讨基督信仰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面临的挑战。信仰与世俗文化之间的互动愈加重要。

在第三周的课程中，邀请了赎世会新加坡的黄财龙神父教授传教学。黄神父先后于菲律宾圣尔方索传教学研究院（St. Alphonsus Mission



2025 年 4 月 29 日，在鲁汶仁义书苑，南怀仁基金会的领导与中国同事以及所有春季课程参与者合影留念。这一天是为期一个月培育课程的第一天。



玛窦神父正在讲授《天主教社会伦理》课程。

and Theological Institute) 及达沃亚典耀大学 (Ateneo de Davao University) 获得宗教学硕士，并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得神学预博士学位。他现任新加坡总教区华人团体教务委员会信仰培育的灵修导师。

本课程从教会历史、圣经、神学及社会发展的视角切入，全面探讨了天主教传教学的核心议题。课程不仅引导神父们思考“如何将基督带给那些尚未听过福音的人”，也进一步探讨“如何在已信者当中再福传”。课程还鼓励神父们反思如何在所处的社会与信仰环境中有效开展福传工作？如何制定切实的福传策略？又如何在响应“向世界传福音”的召叫时，保持平衡且积极主动的态度。

在第四周的课程中，一位修女带领神父们学习如何组织成人慕道班。以《我们共同的旅程》



神父们还前往圣方济各的故乡亚西西朝圣。通常，朝圣的高潮是参加教宗方济各的周三公开接见，历届神父们有机会觐见教宗。

在春季课程期间，周末安排了小组参访和郊游，让神父们有机会了解比利时及周边国家教会历史与文化。具体活动包括：



- ♣ 参访鲁汶大学及达米盎教堂，开幕弥撒在达米昂教堂举行。

- ♣ 德国朝圣，参观圣奥古斯丁的圣言会、海外华人学生协会、以及中国中心、以及科隆大教堂。万廉神父（Martin Welling）将接待神父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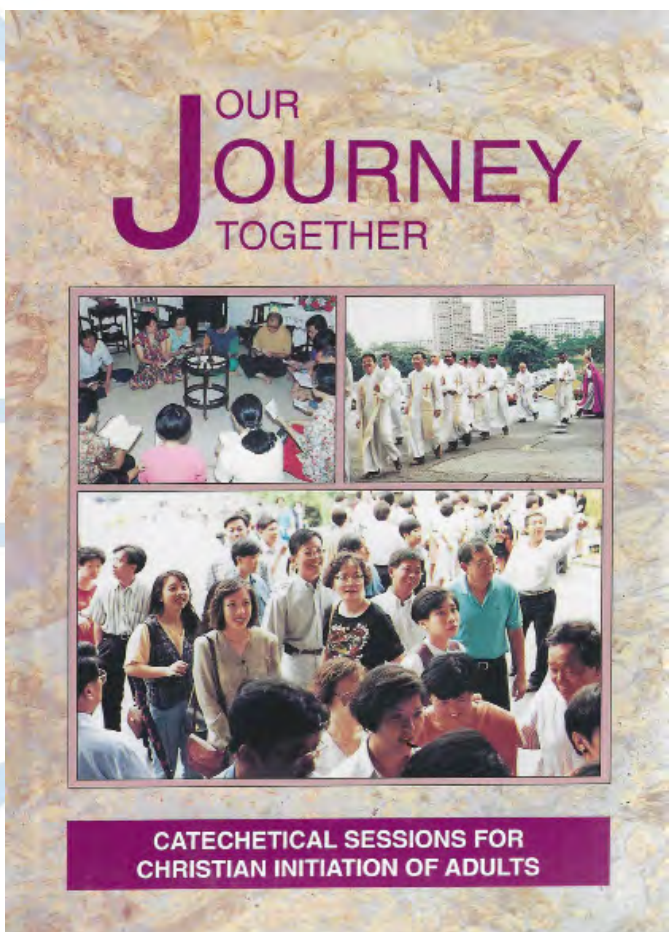
- ♣ 参访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 ♣ 参访布鲁塞尔、圣母圣心会母院，帮助神父们深入了解圣母圣心会在中国的传教历史。

- ♣ 与比利时的华人基督徒到班纳（Banneux）与列日（Liège）朝圣。

- ♣ 耶稣升天节，参观布鲁日，观看世界闻名的宝血游行。这场盛大的游行活动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末，是比利时最大的教会庆典之一，每年吸引着无数游客和朝圣者。对于很少有机会前往欧洲的中国神父来说，亲眼目睹这场盛大的游行，将是一次令人刻骨铭心的经历。

2025 年度春季进修班于 5 月 39 日举行隆重的结业典礼，标志着为期 5 周的深度进修课程圆满完成。神父们带着丰厚的知识、殷切祝福与灵感，踏上回归中国的征程，准备以全新的精神继续他们的牧灵工作，此次活动的成功完成彰显了牧灵工作人员的努力与成长。尽管南怀仁基金会面临诸多挑战，但基金会仍致力于实现圣母圣心会创始人服务中国教会的使命。南怀仁基金会凭借这种崭新的精神，继续推出新的举措，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Our Journey Together）为课程模式，修女会详细介绍成人慕道班的进程，并探讨如何陪伴慕道，在聚会中、共同寻求信仰、分享个人信仰经验。通过这种方法，加强参与者的参与感与互动，最终引导团体将信仰融入日常生活。

春季班的最后一周，神父们将前往罗马进行一次为期一周的圣年朝圣之旅。与往年一样，神父们参观罗马四大圣殿及古罗马的历史遗址。在朝圣期间，他们还参访传信部及其他教会团体。神父们此次朝圣的亮点之一是与切利（Claudio Celli）总主教在圣伯多禄大殿共祭弥撒。此外，

台北举办“范古讲古聊天”课程，与第七届对话灵修工作坊

南怀仁文化交流协会主任：林怡君

范古讲古聊天课程简介

本协会于3月份至5月份推出一个非常难得而且有意思的课程，10次课程为一期，并开放【实体】与【网络】两种上课的方式，有利于台北以外的人也有机会参与。

这次课程的名称为“范古讲古聊天”是一个交互式的聊天课程，以非常轻松的方式来聊“天主教”的故事。此课程之所以难得是因为有两位讲师，一位是西班牙的范凯令神父，北京师范大学宗教学博士，圣母圣心爱子会亚洲区的前区会长，另一位则是台大历史系的名誉教授古伟瀛，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古教授研究天主教史多年，出版过许多著作，教学经验甚丰。这两位主讲者厚积博发，竭尽心力的准备课程，以贡献多年的读书心得。

今年2月，就已有许多神职人员、修会成员及平信徒踊跃报名，参与者纷纷表示，为期三个月的课程内容丰富、收获良多！

台北举行第七届“对话灵修工作坊”

自2021年起，“中华南怀仁文化交流协会”与“辅仁圣博敏神学院”共同连续五年筹办对话灵修工作坊。2024年举办的第六届工作坊主题为“2024祈祷年——迈向希望的禧年”。大约每次工作坊皆有80-100位参与者，反映良好。在此我们也特别感谢“天主教修会联合会促进全人发展小组”担任协办单位，热诚邀请各修会、堂区及教友们共襄盛举。



2025年5月，第七届“对话灵修”工作坊将持续与辅仁圣博敏神学院共同筹办，地点于辅仁圣博敏神学院大礼堂。工作坊以教宗方济各的第四道通谕《祂爱了我们》为主题。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处秘书长陈科神父，他以综观角度阐述第四道通谕《祂爱了我们》重点内容，耶稣圣心所体现的人性及神性上的爱。

崔宝臣神父，辅仁圣博敏神学院校长；主讲题目：圣经中“心”的灵修。

曾庆导神父，耶稣会会士，辅仁圣博敏神学院教师；主讲题目：耶稣会与圣心的敬礼。

范凯令神父，圣母圣心爱子会前东亚区会长；主讲题目：心力衰竭如何康复？《祂爱了我们》是良药解方！

王佩臻修女，耶稣圣心会修女，台北总教区教理推广中心教理讲师；主讲题目：以爱还爱——在“耶稣圣心”的爱中成长。多年来，修女们一直负责台北总教区教理中心的工作，广泛采用耶稣会的方法，提供各种教理研究、灵修工作坊、堂区退省及共融活动。



此外，善牧修女会王奕洁修女，将在本次工作坊中分享她的工作经验，说明善牧基金会如何多年来关注妇女与儿童的权益与福祉，致力服务受暴妇幼、不幸少女、弃虐儿、目睹家庭暴力儿童、未婚小妈妈和高危机青少年，是台湾妇幼保护工作的先驱。

王修女的分享，将带领与会者深入了解福音精神如何落实于社会服务中，展现基督圣心的慈爱如何转化人的生命，并为今日教会的福传与关怀事工，注入深刻的人性关怀与灵修内涵。

台北南怀仁文化交流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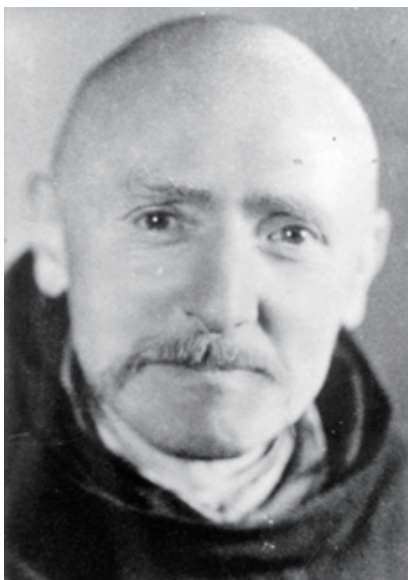
台北南怀仁文化交流协会由比利时鲁汶南怀仁基金会创立。多年来，该协会致力于陪伴中国教会的发展，并推动台湾天主教的牧灵工作。自 2017 年成立以来，协会陆续举办了有关教会历史、教理讲授以及信仰灵修及教会社会训导等方面的工作坊及研讨会。

第二部分：南怀仁基金会将与本地华人教会一起庆祝百年庆典（1926-2026）

2026 年具体要庆祝什么，南怀仁基金会又将如何庆祝？



王老松枢机



雷鸣远神父



光若翰主教

1926 年，教宗庇护十一在罗马祝圣了首批六位中国主教，这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刻。2026 年，我们将庆祝这一事件一百周年。要理解今日中国教会，必须回溯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

因为若缺乏这样的认知，就难以真正理解当今中国教会的现状，这一事件具有何等重大的历史意义？主要推动者是谁？南怀仁基金会又将如何庆祝这百年纪念？为此，我们在此特别记述刚恒毅总主教（Celso Costantini）和雷鸣远神父（Vincent Lebbe, 1872-1940）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与传信部王老松枢机（Van Rossum）以及在罗马祝圣主教的教宗庇护十一的密切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同时要特别介绍由刚恒毅总主教创立的中国首个本土修会——主徒会（Congregation of the Discipuli Domini）。该修会至今仍在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地积极开展教务工作。

南怀仁基金会期望与主徒会及东南亚华人教会团体共同庆祝百年盛典。更多具体庆祝方案，敬请期待下期《懷仁之驛》的详细报道。

近代首批六位中国主教：本地化进程研究¹

二十世纪20年代，中国天主教会陷入困境，传信部当时主要关注那些迫切需要未开教的传教区。在此背景下，荷兰籍王老松枢机（Willem van Rossum）于1918年出任传信部部长，他在当时教会享有崇高声望。他行事谨慎而果断，在推动中国本地主教祝圣事宜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仍需要教廷内部一些高层神职人员的认同，才能接受建立本地主教的必要性。当时在华传教士中，雷鸣远神父堪称一位先知性的重要人物。他恰在庚子事变后抵达中国，早在1908年就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著名主张，并于1917年就开始主张祝圣中国籍主教，对中国教会本地化进程影响深远。

作为一位讲法语的比利时人，雷鸣远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既与法国殖民主义保持一定距离，又能近距离观察其内部运作。当时中国教会不到100个教区，服务于240万中国天主教徒。雷鸣远的提议相当简单，即：其中一些教区规模很小，不足二十名神父，却要服务几千名天主教徒。将一些教区移交给中国主教管辖真有那么难吗？或者退一步说，能否从现有教区中分离出来一个，交给中国主教管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马教廷将注意力转向了传教区。尽管法国政府强烈反对，教廷仍派遣代表去实地考察中国教友、神职人员和修会的状况。为此，教廷采取了秘密外交手段，并实施了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向中国派遣官方教廷代表进行实地调查，二是教宗发布了一封关于传教事务的信函。

1919年7月，教廷任命巴黎外方传教会光若翰主教（Jean-Baptiste-Marie Budes de Guebriant, 1860-1935）担任中国宗座视察员。同年11月30日，教宗本笃十五颁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夫至大》通谕（*Maximum Illud*），标志着中国教会向非欧洲世界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当地司铎的教育必须要有充足的教学科目，不应将本地司铎看作是次要的祭司。反之，当地的司铎必须平等地履行侍奉天主的义务，终有一日管理他们自己的人民”（《夫至大》15）。

罗马教廷推行加强本地圣统制及培育本地神职的改革政策，既出于理想主义，亦基于现实考量。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影响了传教事业，许多传教士被征召回国，担任随军司铎或医疗人员。欧洲青年伤亡惨重，使传教士后备力量难以为继。加之义和团运动等迫害事件，已凸显外籍传教士在华处境的脆弱性。因此，培养强大的本地神职队伍，是确保教会未来生存的必要条件。

1922年1月22日，教宗本笃十五去世，庇护十一继位。雷鸣远等人屏息以待，想看看新教宗是否会延续《夫至大》牧函中提出的大胆计划，更迫切想知道他是否会采纳光若翰所写的教务报告。答案很快揭晓，教宗庇护十一即位仅半年，便秘密委派刚恒毅为驻华特使。在启程前，刚恒毅被擢升为总主教，以便到达中国时成为教会高级别的神职人员。这位肩负着甄选首批中国主教使命的宗座代表，为推进他的计划，刚恒毅特使决定于1924年春，召开全中国主教会议。

1924年在上海召开的这次全国主教会议，是中国天主教会举行的首次全国性教务会议。会议通过了多项重要决议：“毫无保留地向本地神职人员开放所有教会职位，赋予中国神职人员与外国传教士完全平等的权利。在治理架构方面，会议规定各教区主教应组建由三位年高德劭的司铎组成的咨议会，其中必须有一名中国人。会议同时响应圣座要求，明确规定传教士应尽量避免与外国使节接触，并制定了在认为有必要接触时的具体准则。

1926年2月28日，教宗庇护十一颁布《教会事务》通谕（*Rerum Ecclesiae*），将教宗本笃十五的改革主张正式确立为教廷政策。这份以通谕（而非牧函）形式发布的文件，具有更高的教会法权威。《教会事务》通谕明确指出，本地神职人员不应成为自己教会的二等公民。相反，他们应该做好准备，在自己的本地教会中担任最高职位。

1 Summariz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The First Six Chinese Bishops of Modern Times: A Study in Church Indigenization in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No. 3 (Summer, 2014), p. 486-513 (28 pages) online accessible via <https://www.jstor.org/stable/43898674>. Summary by the redaction of Verbiest Koerier. Pictures all from VF publication archives.

1926年3月30日，王老松枢机宣布教宗庇护十一（Pius XI）的决定：教宗将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为第一批中国籍主教举行祝圣礼。9月10日，这六位主教在刚恒毅枢机陪同下前往罗马。10月28日举行了隆重而庄严的祝圣弥撒，礼仪持续4个小时，4万人参与观礼。雷鸣远、光若翰和王老松枢机均出席了祝圣礼，现场还有一大群专程从巴黎、鲁汶等地赶来的中国学生。祝圣礼结束后，六位主教继续前往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访问，每到一处皆受到热烈欢迎。除其他史料外，雷鸣远的书信揭示了任命这六位主教的相关细节。

赵怀义（1880-1927，圣名，费理伯）生于北京郊外长辛店一老教友家庭。他的父亲及其亲戚均在义和团运动中为主致命。在作为北京备修院老师及刚恒毅（Costantini）私人秘书之前，他长期在教区工作。赵怀义是六位中国主教中唯一一位教区神父，46岁时晋牧，被任命为宣化代牧。

成和德（1873 - 1928，圣名，奥多利各，方济各会）：生于湖北省老河口。他10岁时赴意大利，精通意大利语，并加入方济各会，26岁晋铎。1903年返回中国，先从事传教工作4年，随后多年担任神学院教师和管理者。53岁时，被任命为主教，负责蒲圻教区。

陈国砥（1875-1930，圣名，类思，方济各会）：生于山西省安阳村，家中另有一位兄弟也是神父。他21岁时在洞儿沟加入方济各会，27岁晋铎。义和团运动后，他被派往山西视察教会事务。曾任两位意大利主教的秘书，并在太原修院教授拉丁语与护教学长达9年，其间还曾担任山西省教育委员会委员。50岁晋牧，任汾阳宗座代牧。



1924年5月14日至6月12日，
在上海徐家汇主教座堂举行的首次中国主教会议。



1926年10月28日，中国主教祝圣礼



从左至右：胡若山主教、朱开敏主教、赵怀义主教、传信部秘书长 Francesco Marchetti-Selvaggiani 枢机、
光若翰枢机、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陈国砥主教、程和德主教、孙德楨主教。

孙德楨（1869-1951，圣名，默尔觉，遣使会）：生于北京。27岁晋铎，两年后加入遣使会。他先后在北京小修院教授拉丁文12年，后又在乡村地区从事传教工作12年。56岁晋牧。担任蠡县教区主教（今河北省）。

朱开敏（1868-1960，圣名西满，耶稣会）：生于上海名门望族，其家族已有近300年天主教传承。家族在江南地区拥有广泛的商业网络。凭借显赫的社会地位，中国地方官府给予他特殊优待和尊重。朱开敏13岁入修院，19岁加入耶稣会，29岁晋铎，他曾在中国各地从事传教工作。在他57岁生日前夕晋牧，被任命为海门教区主教。

胡若山（1881 - 1962，圣名，若瑟，遣使会）：生于浙江省定海，5岁时成为孤儿，由天主教传教士抚养长大。25岁加入遣使会，28岁晋铎，从事传教工作6年，后在宁波神哲学院教授哲学与信理神学，兼任上海教务委员会神学顾问。45岁晋牧，被任命为台州代牧区。

6位候选人的任命均未引发争议。他们都是在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中长大，自幼接受了良好的信仰教育。他们至少会说一门西方语言，而且说得流利，足以教授一门外语。其中5位是修会会士，这意味着他们的外籍长上可以证明他们受过良好的修院培育。6位主教虽被派往中国各地，但都没有被委以重任。例如：北京、南京等最核心教区，依然由外籍主教把持，十分之九的主教依然是外籍传教士。然而，此次祝圣标志着教会迈出了历史性一步，为后续变革埋下伏笔。6位中国主教的任命，为整个天主教开启了不可逆转的进程。1927年，日本也任命了第一位本地主教。

1933年，越南和斯里兰卡任命了第一批本地主教。1939年，教宗庇护十二在罗马为来自全球各大洲的12位主教举行祝圣礼，其中包括第一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籍主教（乌干达）和第一位马达加斯加籍主教。1945年，教宗庇护十二任命了第一批传教区的主教擢升为枢机。截至1951年，全球传教区本地主教总数达100位，中国已拥有45位本地主教。在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年）召开时，世界各地本地主教悉数出席。而中国正是这一进程的先行者，1926年的破冰之举，成为馈赠普世教会的礼物。

刚恒毅生于1876年4月3日，在意大利东北部波代诺内省のカステリ翁镇（Castions），父亲Costante Costantini是一位建筑师，母亲Maddalena Altan。刚恒毅在十个孩子中排行老二。自1887年，他继承了父亲的泥瓦匠手艺，后来决定出家修道。他于1892年至1897年，在波尔托格鲁阿罗修院（Portogruaro）接受基础教育。1897—1899年，以半工半读形式在罗马圣多玛斯学院（Accademia di San Tommaso）深造，1899年获哲学与神学双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12月12日，任意大利陆军随军司铎，在前线服务士兵们的灵性关怀工作。



刚恒毅枢机



教宗庇护十二世

² 资料来源：魏扬波（Jean-Paul Wiest），《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词典》；周方济各，主徒会，玛利诺会温顺天（Peter Barry）神父译；《刚恒毅与中国教会》，刊登于《鼎》2022年2月刊。

中国

1921年，教宗庇护十二授予刚恒毅 Hierapolis 主教领衔，一个月后接受了主教祝圣礼。1922年8月12日，教宗庇护十一任命刚恒毅为首任驻华宗座代表。一个月后，教宗又授予他 Theodosiopolis 总主教衔（位于意大利 Arcadia）。赴任前，刚恒毅先后觐见教宗庇护十一和王老松枢机，二人嘱咐他务必全面落实教宗本笃十五，于1919年关于传教工作《夫至大》通谕的所有要求。1922年11月8日，刚恒毅抵达香港。



左：教宗若望二十三，右：刚恒毅枢机
(the later Pope John XXIII) © Associazione cardinali costantini. It)

为了完成在华期间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使命，刚恒毅不仅实施了《夫至大》通谕中的传教思想，还借鉴了1926年教宗庇护十一《教会事务》通谕中的福传方针。根据刚恒毅枢机的理念，中国教会属于中国人民。但与此同时，它也与圣父教宗保持共融。

中国有句古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同样，若要真正建立本地教会，必须从教育入手，换言之，唯有让本地圣职人员获得更完善的培育，才能为本地教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刚恒毅枢机是一位高瞻远瞩之人，在他主持的1924年中国天主教首届教务会议上，决议在中国各地设立14所大修院，旨在为有志晋铎的青年提供更高水准的哲学与神学教育。截至1936年，其中11所大修院已建成，并全面投入培训神职人员的工作。他还敦促各教区主教和传教区负责人，选派合适的修生及年轻司铎前往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或其他高等学府进修中文及人文学科。

建立主徒会

刚恒毅枢机在其著作中频繁提及圣保禄宗徒的传教理念。这位被誉为“外邦人的宗徒”，凭借渊博的学识与炽热的福传热忱，不仅广传基督的福音，并建立地方教会。刚恒毅指出，圣保禄之所以能够成功感化雅典人，关键在于他对希腊文化有着深刻而透彻的理解。因此，他坚信中国教会的本地化绝不能仅限于建立圣统制，更需践行圣保禄的传教方法。当然，传福音本不应区分贫富贵贱，也不应区分受教育程度之高低。但若真正影响并归化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教会必须培育一支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有深刻了解的圣职人员队伍。

刚恒毅枢机洞察此情，遂决定创立首个中国籍圣职修会——主徒会。他希望这个团体能够通过文化传福音，从而为整个中国人的皈依做贡献。1926年12月12日，他向传信部正式递交了成立修会的申请。1927年1月4日，传信部部长王老松枢机复函刚恒毅，批准成立修会。此后，刚恒毅在宣化教区赵怀义主教及张步来神父协助下，在宣化城外察哈尔购置了土地，并建立了主徒会第一座母院，命名为“厄玛乌”会院。在修生培育方面，刚恒毅特邀西班牙赎世会神父协助。1931年3月31日，主徒会正式获得圣座批准成立。

刚恒毅为主徒会提出一条启发性的箴言：“不要反对教会，教会是我们的一切，一切为了教会”。由此可见，刚恒毅期望主徒会的全部使徒工作，皆应以教会为中心。事实上，他特别强调：倘若修会的宗旨与教会的目标发生冲突，那么主徒会必须优先考量教会的宗旨。

南怀仁基金会在其出版物中秉承这一传统，并竭尽全力积极推动中国信仰本地化，至今仍在继续努力。

祭祖礼仪的本地化

几个世纪以来，祭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早在 17 世纪，耶稣会就设法获得罗马的许可，将教会礼仪与中国祭祖习俗相融合。虽然教宗当时予以认可，但教会内部中的其他人尚未做好准备，向祖先敬香、献花、献水果等礼仪被视为“迷信”。经过教会内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激烈争论，罗马教廷最终选择禁止祭祖礼仪，从而平息了争端。却由此导致了皇帝与教宗之间的历史性误解。这一决定给中国教会造成的沉重负面影响，其余波至今未平。

梵二大公会议在此问题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不仅准许用中文举行弥撒，更大力推崇“祭祖礼仪”。此举正式否定了“迷信”的指控。但当时中国大陆的主教们未能出席梵二会议，仅有台湾的于斌枢机和罗光主教参加了会议。正是他们二人共同制定了中文版“祭祖礼仪”的范本，该礼仪自 1970 年代起，在台湾各教堂正式沿用至今。圣母圣心会在台湾服务的堂区一直积极践行祭祖礼仪。



在中国大陆祭祖礼仪至今未能实行。并非因为主教们的反对，而是因为基督徒尚未做好准备。没有人会责怪他们，这恰恰体现了他们对罗马教廷 300 年来一贯的顺从。由于当年向祖先献香被定为“迷信”，并视为犯大罪。中国教友始终恪守教宗的禁令，三百年来对禁令的认知，已形成了教友们对祭祖礼仪的消极心态，若要将其转化为积极的接纳，甚至实践此礼仪，恐怕要求过高。出于审慎考虑，主教们明智地选择等待，直到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经验准备就绪。

自 1982 年以来，圣母圣心会（Scheut）与南怀仁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推动对本地化的开放态度。在比利时或荷兰，中国基督徒与西方基督徒共同举行的“华人祭祖”礼仪，往往成为组织华人活动的机会，从而让基督徒体验其深刻含义。为帮助理解此庆典，以下作进一步说明。

祭祖礼仪庄严肃穆，完全遵循中华古代礼仪的传统风格。在一个特设的祭台中央供奉祖先牌位，两侧陈设鲜花、水果、酒和香以备献祭。祭台用彩色布料覆盖，以中文隽语阐明其深意：“上主诸般恩赐，皆由祖考而达于我辈。今以仪献，愿先人永飨真善美之极诣。”

- 献香：象征钦崇天主之礼，亦表我等祷声上达天父。
- 献花：寓示凡尘世至真、至美、至善。
- 献果：既表所受主恩，亦显所行善工。

祭台两侧悬有木制楹联，黝黑光亮的背景上写着金色的字体，其文字乃康熙御笔亲题“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这副对联赞颂永恒全能的上主，创造宇宙者的仁慈与公义。世界上极少国家或文化能保留如此古老的帝王训谕。中国基督徒为此深感自豪。因此即使在今日，这些御题对联仍然可以在中国许多教堂中看到。

南怀仁基金会已在比利时国内外数十个地方举办过敬天祭祖礼仪，其中包括圣母圣心会会院、鲁汶、希尔德（Schilde）、凯瑟洛（Kessel-Lo）、福赫特（Vught）、布鲁日（Bruges）、通厄伦（Turnhout）、贝弗伦（Beveren）、哈斯东克（Haasdonk）、列日（Liège）、让布（Jambes）、弗拉蒙（Framont）

等堂区，甚至扩展至荷兰和德国圣奥古斯丁会院（Sankt Augustin）。我们的同仁郭斌生先生从台湾给我们送来了所有必要的礼仪用具和服装。

南怀仁基金会更曾两次在国家电视台主日时段全程直播感恩祭，和祭祖礼仪：首次由台北总教区贾彦文主教主礼，第二次由台北总教区狄刚主教，庆典由台北圣母圣心会光仁小学音乐班中乐团伴奏。每次的礼仪都给西方基督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祭祖仪式如下：

1. 祭祖典禮開始：（司仪肃立宣唱：请全体起立，主祭者就位，陪祭者就位。）
2. 司仪宣唱：读经（德训篇，44，1-15，）（全场静默聆听经文）。
3. 读经后，司仪宣唱：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祖德宗功，万世永赖，饮水思源。
4. 献礼仪式：（司仪依次唱礼）
 - 献香
 - 献花
 - 献果
 - 献酒

陪祭人依序将祭品呈递主祭，主祭虔敬献于祖先。每献一次，皆敲击一次铜磬，全体肃立行鞠躬礼。仪式庄严肃穆，发人深省。至终献毕，铜磬三响，全体向祭台行三鞠躬大礼，将典仪推向高潮。

5. 司仪宣唱：礼成

祭祖礼仪深刻体现了中国人信仰的内涵，是华夏文明独有的精神瑰宝，其庄严与深厚令其他文化为之赞叹。中国教会成功实现了这一传统礼仪的信仰本地化，并以此为荣。令人欣慰的是，南怀仁基金会积极致力于推广祭祖礼仪，海外的信众在静默观礼中，亦能感受到灵性的滋养，此礼仪堪称教会间交流与共融的典范，值得广泛借鉴。

中国本地化历史：

圣母圣心会燕鼎思神父（Joseph Jennes）的《中国四百年教理讲授史》，曾多年来作为一本培训圣母圣心会传教士的手册

在 1920 至 1930 年代间，每年约有 10 至 15 位圣母圣心会神父在完成系统的中国文化培训后前往中国。这些传教士从 18 岁加入圣母圣心会后，便开始为到中国实现福音本地化做准备。当他们前往中国时，他们已接受 6 至 7 年的中文强化课程，具备了阅读中文报纸的能力，还系统学习了中国文化、历史和地理。其中，燕鼎思神父教授专门负责讲授中国基督宗教本地化历史，为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燕鼎思神父在罗马额我略大学获得教会史博士后，成为鲁汶圣母圣心会修院的主要教授之一。1940年代，他在该院开设《中国四百年教理讲授史》课，详细阐述了利玛窦在中国推行本地化的尝试，以及耶稣会与其他在华传教修会之间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辩论。1942年，燕鼎思神父出版了荷兰文专著《中国四百年教理讲授史》，该书成为当时唯一一本中国教理书籍。甚至在30年后，当圣母圣心会于1970年在台北建立台湾牧灵中心时，人们发现这仍是关于教理讲授史唯一的系统性研究著作。这本书随后由圣母圣心会栗鹏举神父（Bert Van Lierde）将其译为英文，耶稣会士田永正译为中文。牧灵中心将两种译本合集出版，作为该中心培训课程的指定教材。（参见附图）

时至今日，这仍然是唯一一本关于中国教理讲授史重要研究的著作。为此，南怀仁基金会决定重新出版该书的中英文修订版。杨梵虹为新版增添了重要的学术注释，使内容更加丰富。这部著作至今仍填补着学术空白，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各修院教理课程的重要教材。虽然燕鼎思神父在圣母圣心会内最为人知的是，他是日本传教区的开创者，但在此之前，他已是圣母圣心会最杰出的学者之一¹

通过中国风格版画传递基督信仰：

圣母圣心会狄化淳神父（Leo Van Dijk）的大胆创新之举

燕鼎思神父在他的《中国教理讲授史》一书

1 燕鼎思神父也对“礼仪之争”进行了研究，并将相关研究笔记交给了他的一名学生——圣母圣心会士Frans Bontinck。燕鼎思神父认为这位学生未来可能成为该领域的重要学者，因此他鼓励Frans Bontinck对这些笔记进行深度研究。Frans Bontinck不负所望，于20世纪50年代在罗马额我略大学完成了以“礼仪之争”为研究主题的历史学博士论文。该论文出版后，至今仍被视为研究礼仪之争的权威著作，是相关学者藏书不可或缺的必备文献

中指出，直至19世纪，中国都缺乏适合视觉化教理讲授的本土风格版画。虽然中国风格的圣母像很早就已出现，但直到19世纪，上海耶稣会才率先尝试用中国风格版画表达基督信仰：首先是曾在罗马接受绘画训练的耶稣会范佐廷



修士（John Ferrer）修士，他于1852年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培养中国基督徒艺术家的学校。这一开创性事业本已取得进展，却因学校失火而中断。随后，耶稣会范世熙（Adolphe Vasseur）神父通过“圣像工作室”（Oeuvre des Images）与上海孤儿院合作制作彩绘版画，做出了突出贡献²

在此之前，传教士们也带来了大量精美的版画，这些版画都是从欧洲最常用的教义版画中精选出来的，例如，Maison de la Bonne Presse



Plate 1 of Wenda Xiangjie

2 南怀仁基金会档案馆中珍藏着一本《救主行实图解》的副本。这部著作以传统文学笔法讲述了圣经旧约与新约的救恩故事，书中配有色彩鲜艳的西方风格版画插图。这些版画以及部分后期作品已经更加“本地化”，因其内容或艺术风格已不再适合当代教理讲授，但它们是珍贵的文献，见证着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传福音的方式，发生的变化，以及历代传教士多年来为寻求更合适的传播方式经历的演进历程。传教辅助会雷振远神父（Raymond De Jaeger）所著的《天堂要理》（Catechesis on Heaven）是中国天主教会历史文献中一个杰出例子。这类文献的保存与传播，对于研究中国教理讲授史限量出版具有重要意义。



Plate 28 of Wenda Xiangjie

出版的《问答图像》（Catéchisme en Images）中的版画。舒马赫（Schumacher）的德文版画也被广泛使用和发行，直到 20 世纪。当时传教士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国适应西方”，而不是“西方适应中国”。直到 20 世纪初，才零星出现用中国风格版画表达基督信仰。

在此背景下，圣母圣心会的狄化淳神父采取了一项大胆而富有探索性的举措，在宣讲中寻求本地化。1928 年，他出版了《问答像解》一书，共 40 幅彩色版画，并配有详尽的解说文字，供教理老师在课堂上使用。这些中国风格的图画试图直观地向慕道者展示：作为中国人，如何在中国社会熟悉的环境中体悟福音。画作整体营造出庄重虔诚的静谧氛围，每幅作品的颜色、构图与表现形式均符合中国美学，圣经中的信息以视觉化的中式风格呈现的淋漓尽致。

1935 年，狄化淳神父出版了四十幅《救主行实图解》版画，每幅均配有释文。此外，他还出版了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大型彩色教理版画，用于信仰启蒙教育。狄化淳神父的举措大胆而新颖，人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沿用西方艺术形式呈现福音已持续 200

余年。在信徒和非信徒的心目中，福音与西方文化的绑定早已成为一种公认的传统。要改变这种心态，接受福音信息适用于所有文化、种族和语言，需要极大的努力与调适。狄化淳神父的版画在这一领域堪称开创性的挑战。事实证明，教友们很快接受了这场变革。1930 至 1940 年代间，狄化淳神父的版画在中国教会中广为流传。狄化淳神父是一位传教士，先在甘肃，后在宁夏传教，实为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先驱。他天资聪慧，兼具艺术才华与开拓者的勇气，以创造性成功叩开了文化融合之门，并获得了成功。1928 年鲁汶传教学研讨周期间，圣母圣心会康国泰神父（Louis Schram）与狄化淳神父的开创性举措发表了专题演讲。

方希圣神父（Mon Van Genechten CICM）： 从一位佛兰芒艺术家到中国艺术家³

狄化淳神父之后是另一位来自佛兰德的艺术艺术家方希圣神父，也踏上了中国之旅。他既是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又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艺术艺术家。抵达中国后，圣母圣心会长上及宗座代表刚恒毅都鼓励他继续精进艺术造诣。方希圣神父本人也充满胆识与创造力，非常愿意向中国艺术家虚心求教。



方希圣神父

他曾在位于北京西山的一座寺庙里住了数月，临摹古代壁画以掌握中国绘画的精髓。1940 年代，他成为唯一一位在北京与中国艺术家一起展出其中国作品的西方艺术家。汉学家孔之昂（Koen De Ridder）和耶稣会魏明德（Benoît Vermander）都曾高度赞赏方希圣神父的艺术贡献。

当方希圣神父初到中国时，西湾子教区省会长石德懋（Leo De Smedt, 1881-1951，后晋升主教）深受宗座代牧刚恒毅倡导的文化适应理念的影响，遂委派方希圣神父学习中国传统美术，

³ 资料来源《鲁汶中国研究》第 11 期。方希圣生于 1903 年，比利时的海尔（Geel）。1974 年去世于海尔。1930 年赴华传教，在西湾子教区各堂区从事牧灵工作，直到 1938 年。1947 年之前，他一直在北京推广中国基督宗教艺术。1947 年回到比利时后，继续推广中国基督宗教艺术。1950 年在罗马展览会上推广中国基督教艺术。1971 年退休后回到海尔。



方希圣神父的早期作品《幽静的 Kempen 乡村》

以使福音更易为中国民众所接受。1937至1938年间，方希圣神父先后在内蒙古六号和山西大同的教堂创作系列壁画。此后他出任北平天主教辅仁大学艺术系教授，在著名文人画家溥心畲（1896-1963）指导下精进中国画艺。

1939至1942年间，他以中文名“方希圣”举办一系列画展，并越来越获得中国评论界与西方媒体的双重认可。战争期间，方希圣神父创作了巨幅画作《苦难的中国》，以艺术记录民族浩劫。

我一次次凝望方希圣神父的艺术作品，每一次都带着崭新的感动与敬意。然而这份敬意，并非主要源于他对中国绘画技法的纯熟掌握。当我注视他的水墨丹青、木版刻印或摄影作品时，总能感受到某种更深层的共鸣与亲切感。这种艺术作品给我的印象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正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佛兰芒画家，方成为真正的中国画家。”

方希圣神父早年在佛兰德创作的作品，就已体现了佛兰德传统艺术中特有的人文关怀、慈悲与民间智慧。当他初习中国画技时，曾经历艰苦的摸索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难免带几分生硬与程式化。他当时肩负着创作“宗教艺术画”的使命，更加剧了这种趋向。但中国绘画的严格训练，极大地丰富了他对线条和山水意境的感知，他的画作逐渐充满了中国画所追求的气韵与宇宙生机。

方希圣神父敏锐地捕捉到中国艺术传统的多元性，尤其是佛教艺术和民间艺术，皆成为汲取灵感的源泉。正因如此，一些中国艺术家或许仍对其艺术抱有疑虑，担心这种融合偏离正轨，不配称为“中国艺术”。这种疑虑实则源于对中国艺术本质的狭隘认知。过去50年来，



《苦难的中国》巨画

中国艺术发展的精华正是重新找回了其在社会功能、技法体系、宗教精神与地域特色上的多元化。

方希圣神父在蒙古的岁月，无疑为他打开了通向这种多元化的视野。而对中国艺术多样性的探索，最终引领他抵达更广阔的艺术自由之境。归根结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界定方希圣神父的艺术属于东方还是西方，而在于他的画作是否撼动人心且富有意义。

他的画作深刻表达了普通民众的灵魂、痛苦与尊严。在此意义上，它们比大多数传统的“宗教”画作更具“宗教性”。方希圣神父笔下那些布满饱经风霜的面容，勾勒出一条全人类共同跋涉的苦路，尤其是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历程。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为方希圣神父的艺术赋予了更深的内涵。他所创作的基督宗教艺术，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文化移植，而是植根于历史经验的真正创作。昔日的佛兰芒艺术大师们，不正是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众人认可的吗？

方希圣神父擅长刻画人物面部的皱纹。这些皱纹表现出一个人的命运，在历史中留下的印记。无论是中国老年人还是弗拉芒老妇人脸上纵横的皱纹，都令人感受到他们与祖先所走过的艰辛之路，还可以感受到天下贫穷弱小者之间无声的团结，这种团结超越了时空的界限。

一幅画作能够浓缩多重生命体验：审美的、精神的、政治的等。解读方希圣神父的艺术作品，必须将其置于当年中国社会与中国教会艰难背景下审视。他的作品凸显苦难特质，而这或许是它们在今日仍具现实意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常有人说中国艺术不呈现痛苦，它总是旨在表现祥和与和谐。事实上，文人艺术的确如此，然民间艺术绝非如此。即便在所谓“高雅艺术”领域，也有各种间接方式（如通过衣服线条的布局、或借助

风景隐喻……)来表达人类的苦难。

方希圣神父从自身的艺术传统中,学到了大胆表达人类的苦难,他的做法将为中国当代艺术家所效仿。水墨画能够以自身方式表现贫穷、丑陋与痛苦。中国传统艺术中本来就蕴藏着能够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资源,但与西方艺术的碰撞,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这些资源的价值。如今,关键问题已非固守某种“永恒本质”的文化或艺术遗产,而是创造新的、富有创造力的艺术融合。

从本世纪中西艺术之间的碰撞中我们可以汲取一个清晰的启示:首先做你自己,从滋养自身文化中艺术精神领悟与学习,如此,你才能真正进入另一种文化和另一个艺术世界。

进入另一个文化不会让你保持原样,而是迫使你经历彻底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蜕变。与此同时,你深入骨髓的传统与全新体验之间的对话,将引导你向内在自我更深处探索,并帮助您发掘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方希圣神父创造了一种真正属于他自己的艺术,见证了他那一代人的挣扎历程。正因如此,他的作品与生活至今仍对我们具有深刻意义。

中式还是西式?

在中国,基督信仰本地化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甚至在狄化淳神父之后仍然如此。一些修会神父也对此做出了贡献。吴慰华(Van overwalle Maurits)绘制的洗者若翰中国风格画像广为人知。同样,司福音神父(Steenackers Jan Baptist)建造了著名的小桥畔教堂,其风格为中国宫殿风格。当石德懋主教计划在西湾子建造一座主教座堂时,他首先绘制了一个完全采用中国风格的设计。但当地的信友们不同意,并回复他说:“我们想要一座教堂,而不是一座寺庙”。著名的建筑师和羹柏神父(Alfons De Moerloose)在中国北部建造的大部分教堂和修道院,都没有遵循刚恒毅提出的本地化风格。和羹柏神父认为天主教堂的风格应该是哥特式的。

中国艺术家在台北“华明艺廊”推动本地基督宗教艺术

圣母圣心会离开中国 50 年后,尽管新建了几十座教堂,除了北京著名的全国修院外,采用中式风格的教堂仍屈指可数。这一现象印证了一个深刻认知:福音本地化绝非仅靠教理宣传画、圣像或教堂建筑风格就能实现,其中还有许多其



圣母油画, 陈美春作品



圣母圣心会省会长 Wim Bollen 神父在讲话



蔡文兴主教(Kupfer)在台中剪彩



张春申神父在演讲



中国耶稣，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吴浩年的作品



耶稣是主油画。
Shu hui she 的作品。



木刻圣母版画，
朱明的作品。



罗光主教



叶伟明先生



姜欣



郭斌生



王愈荣主教在演讲



贾主教、姚昭明和习慕蓉在讨论“艺术本地化”。



他更重要因素。

1963 年，时任华明中心主任的圣母圣心会袁士林神父（Albert Geusens）筹办的首届大型艺术展，恰如其分地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与其开设书店，何不建立基督宗教艺术推广中心？”这一创举不只是“华明艺廊”的开始，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唯有中国艺术家自身，才能真正用文字、图像或建筑来表达中国基督徒的信仰”。这可能就是袁士林神父的直觉。

1970 年，圣母圣心会已成立台湾牧灵中心培育教会人才，推动梵二大公会议的牧灵革新，同时注重信仰在中国开展信仰本地化。中国艺术家在此过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普通人往往只能浅层感知事物表象，而艺术家却能从万物中看到真、善、美，并通过雕塑、音乐或绘画予以表达。这项工作必须由中国艺术家来完成，无人能够替代。为此圣母圣心会决定将原书店名字改为“华明艺廊”，供中国艺术家展示他们的作品，激励台湾教友活出信仰。狄刚总主教与当时的光仁基金会高度认同这一理念，在他们的合作支持下，“华明艺廊”得以成立。

在狄刚主教与华明基金会的鼓励下，叶维民、姜欣和郭斌生等骨干推动该项目运作了 8 年。中国艺术家在“华明艺廊”展出他们的作品。在为期一周的展览后，展品巡展至台湾其他教区。每次展览均由当地主教主持开幕仪式，神职人员、修会人士、信徒与非信徒纷纷前来观赏，以不同的方式体验自己的信仰。这项卓越的创举延续了圣母圣心会狄化淳神父和方希圣神父 50 年前推动的事业。此次的台湾展览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每次展览完全由中国人组织操办，由中国艺术家传递艺术讯息，成效显著。每次展览都标志着台湾本地教会的显著发展，或许有朝一日，这项创举将重焕生机。



《中国宗教艺术》一书，出版于 1980-1988 年间，华明艺廊展品。

40 年前鲁汶大学校长 De Somer 开启了一项大胆且历史性举措

南怀仁基金会档案

1985 年，在鲁汶大学校长 De Somer 的邀请下，三位中国“官方”主教（不被罗马教廷承认）访问了比利时鲁汶大学及比利时教会。这次为期 13 天的访问由南怀仁基金会组织安排。由于 De Somer 校长的离世，鲁汶大学由新任校长 Roger Dillemans 正式接待了三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主教。比利时枢机丹尼尔斯（Danneels）设午宴款待主教们，并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圣母圣心会也热情接待了这些来自共产主义的中国主教，1950 年，那些被迫离开中国的年迈传教士们也与这些中国主教举行了会谈，并一同祈祷。

此次访问具有历史意义且堪称破冰之举，中国首次正式批准天主教主教代表团出访西方国家。罗马教廷虽无法予以正式许可，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默许了此举……此次访问成为南怀仁基金会开启长达 40 多年与中国对话的起点。

以下是 Roger Dillemans 校长在鲁汶大学校长办公室欢迎中国主教时的致辞摘录，以及主教们在访问比利时期间，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代表以及比利时各教区机构代表，于鲁汶告别晚宴上的演讲节选。

圣母圣心会：韩德力神父

尊敬的主教，中国大使，女士们、先生们：

我深感荣幸并倍感欣喜，能在此欢迎中国友好代表团莅临我校，此次访问的重要性及其深远历史意义，或许要等多年之后，我们许多人方能完全领悟。

此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由中国天主教主教代表团访问欧洲。诸位选择将比利时作为首访之地，实乃我方殊荣。比利时一直为与中国的关系感到自豪，尤其是来到鲁汶，这是一个



富有深意的决定，我愿在此进一步说明。

我们大学的“南怀仁基金会”致力于比利时与中国关系史的研究。通过这项研究，我们了解到，比利时在历史上始终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友谊与合作。早在1832年，也就是比利时独立后的第二年，比利时便开启了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计划。

比利时通过修建京汉铁路，以及在中国建立首座钢铁厂——汉阳，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令人巧合的是，汉阳正是我们今天在座嘉宾之一涂世华主教的教区。我们的研究证实，当时，比利时在科技和文化两个层面上，与中国开展了仅次于美国的最为密切的合作项目。1926年，阿尔贝国王决定成为第一个将天津租界归还给中国的西方国家，此举证实了比利时与中国的友谊，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我们对此深感自豪。

尊敬的各位，今天，我们迎来了中比关系的新阶段。我们深刻认识到，您此次的友好访问可以成为贵国与我国、中国教会与我国教会之间，甚至我们大学与贵国天主教神学院之间密切交流新的开端。

您们决定来鲁汶意义重大，因为一些著名的传教士，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中国。意大利耶稣会士于1654年在我们大学为年轻的耶稣会士们演讲结束后，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的极大兴趣，三位著名的耶稣会士从鲁汶出发前往中国：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Malines）、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 Maastricht）和吴尔铎（Albert Dorville, Brussels）。随后不久，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Pittem）也从这里出发。

请允许我补充一点，我的叔叔、圣母圣心会闵玉晴（Alphons Bermyn）曾是鄂尔多斯（内蒙古）的主教。今天，我很荣幸在此迎接内蒙古的主教。顺便提一下，王学明主教至今仍佩戴闵玉晴主教的戒指（见照片）。

非常感谢您们接受我们的邀请，来此进行访问。这所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历来为全球各地教会培养神学和哲学教授。许多中国学者也曾在这里接受教育。我们非常高兴并愿意继续这一传统。我们深知，重新开放中国神学院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希望你们与我校神学和哲学院的教授们互通有无，致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你们的需求。愿这能促成我们大学与贵国神学院之间富有成效的交流，并为贵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贡献，对此我们深表敬意。



在华出版的一部新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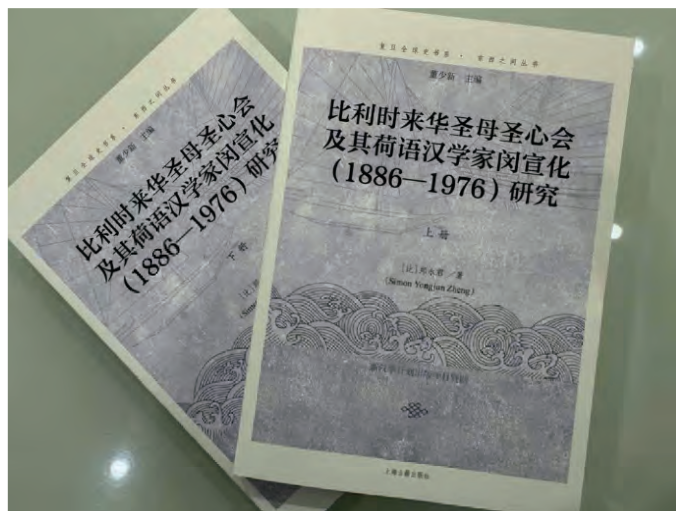
《比利时来华圣母圣心会及其荷语汉学家闵宣化研究》

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永君

比利时传教士，尤其是弗拉芒地区的传教士，在中国浩瀚的文史资料中多被提及。他们的手稿资料，例如鲁布鲁克（van Rubroeck）、南怀仁（Verbiest）等人的著述，以他们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关于中国的宝贵信息。然而，比利时圣母圣心会（CICM）传教士，特别引起了我的关注，且激发了我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们的传教经历和在华事迹从而成为了我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

圣母圣心会创立于 19 世纪，早期主要由比利时籍与荷兰籍的传教士组成，且集中在中国开展传教事业。首批四位会士于 1865 年踏上这片东方大国，并在其后的 90 年中，陆续有近 700 位志同道合者追随了他们的足迹，在华北诸多地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对华的贡献良多，其中包括建立学校、创办各种慈善组织，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他们开展的大量学术研究，且逐渐肩负起将中国的文化、民族、语言、社会及风俗介绍至欧洲的使命。久而久之也催生了第一批比利时籍的传教士汉学家。其中，闵宣化神父（Jozef Mullie, CICM）便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学者。他在汉语领域，尤其是北方方言与文言文的研究上，在当今学界仍具有其学术价值和影响力。

此耗时 4 年撰写的博士论文现已在中国出版，并收入母校复旦大学“复旦全球史——东西之间丛书”之中。该著作分为上下两卷，第一卷对圣母圣心会的初期开创史进行考证，以此为读者揭开该修会在本国创会时遇到的各种艰辛以及初抵中国时面对的诸多挑战；第二卷则聚焦闵宣化神父的在华传教生活，以及他在汉学领域，尤其是汉语语言学方面的学术贡献。最后，我在书中又概述了闵氏的两部重量级的汉语语言学专著，借此希望用一个较为全面的视角，帮助读者来认识这位几近被遗忘、却在荷语汉学界曾作出重要贡献的汉学家。我认为，闵宣化神父为我们遗留下来的大量研究成果，无疑对当今荷语汉学界在汉语语音、语法、句式结构以及惯用语的研究方面会带来一些新颖的观察视角与学术启迪。



中文简体两册，共 602 页

bookorder@fvi.kuleuven.be

该邮箱用于图书订购或出版物咨询

作者简介：

郑永君（Simon Yongjun Zheng），2021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其研究受到南怀仁基金会资助。现作为研究员任职于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督宗教在华史，荷语文献中的传教士汉学，以及中比文化交流史。



缅怀鲁保禄 (Paul Rule) 教授



南怀仁基金会档案：摄于 1995 年，鲁保禄在南怀仁举办的国际会议上演讲，会议主题为“清代低地国家与中国关系史”（1644-1911）。

2024 年 11 月 20 日，鲁保禄教授与世长辞。鲁保禄教授曾是我们学术会议的常客，深受参会者爱戴。他发表了诸多卓越的研究成果，尤其专注于耶稣会在华历史的研究，他的论文我们荣幸地刊载于研讨会论文集中。

鲁保禄教授（1934-2024），中国耶稣会传教史研究学者

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中心主任：柯毅霖 (Gianni Criveller)

我初次结识鲁保禄教授是在 1994 年，在意大利布雷西亚 (Brescia) 举行的一场关于艾儒略 (Giulio Aleni) 的开创性研讨会上。艾儒略是首位卷入中国礼仪之争的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我至今仍记得鲁保禄在那场历史性争论中为艾儒略立场慷慨陈词的情景。此后，我们曾无数次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欧洲各地举办的中国传教史研讨会上重逢，会面次数之多已难以计数。

在我研究艾儒略的论文期间，鲁保禄于 1986 年所写的《孔子或孔夫子》一书是必读的基本文献。此外，他还发表了数十篇关于明末清初，中国传教史内容翔实的研究论文，每一篇都体现了其严谨的学术态度。

鲁保禄生于澳大利亚，并在当地耶稣会学校读书。2002 年之前，他在墨尔本拉筹伯 (La Trobe) 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和中国历史，还一直与众多国际学术机构合作，尤其是与旧金山和澳门的利玛窦学社。

鲁保禄对耶稣会在中国传教史的学术成就贡献巨大，是该领域学者不可或缺的基石。他晚年最具影响力的学术遗产正是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研究——他与科兰妮 (Claudia Von Collani) 合作完成了《北京纪事》 (Acta Pekinensia) 的英文翻译、评注与注解工作。

这部巨著由耶稣会纪理安 (Kilian Stumpf) 用拉丁文编纂，1705 至 1710 年，铎罗 (Maillard de Tournon) 使团来华的详细经过。这部卓越的著作包含大量未经编辑的史料，共分三卷，分别于 2015 年、2019 年和 2024 年出版，共约 2500 页。事实上，鲁保禄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坚持学术工作。

图片报道



3月15日，北京教区北堂，西堂，东堂教友在禧年开启了朝圣之旅。一百多教友，由张晓卓神父和王修女带队每十个人左右为一组，从西堂出发徒步朝圣，先到北堂，最后到王府井堂（东堂）全程7.8公里。



4月30日，一个由35位中国教友组成的朝圣团抵达鲁汶南怀仁基金会，并在圣达米盎教堂举行了感恩祭。



北京北堂禧年朝圣。



2025年3月15日，宁波教区余姚堂区的120位天主教信友在上海佘山朝圣。



2025 年 4 月 29 日，衡水教区封新卯主教祝圣三位新神父



圣达弥昂神父墓前



参观德国圣奥古斯丁的圣言会中国中心



5 月 1 日圣体游行后，与 Zoete Waters 圣母小堂的本堂神父合影



5 月 18 日，班纳 (Banneux) 朝圣



切利总主教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主持感恩圣祭

南怀仁基金会

— 使命宣言 —

圣母圣心会于 1981 年举行的第九次修会总大会时，针对修会过去曾在中国华北地区的 90 年 (1865-1955) 传教历史，做了一次回顾与评估，并确立了一个新的方式来实现修会自 1862 年以来，由会祖南怀义神父 (Theophile Verbist) 在修会宪章所订下的“中国优先”之福传使命。于是，圣母圣心会于 1983 年成立了南怀仁基金会来落实并更新圣母圣心会的“中国优先”。南怀仁基金会的任务是与中国以及全球华人团体发展一个新的合作和交流关系。此后，南怀仁基金会一直秉持这项使命，透过举办各种对话、合作和交流活动，延续着圣母圣心会百年传承“中国优先”之使命。

这 23 年以来，南怀仁基金会在台湾有今天的成就和发展，皆要归功于圣母圣心会以及台湾平信徒和教会领袖的奉献精神 and 重要贡献。2006 年，圣母圣心会将南怀仁基金会转给比利时的“鲁汶南怀仁基金会” (Verbiest Foundation-Leuven)，如今是合法登记立案的机构。鉴于其宗旨并且对普世教会的开放，南怀仁基金会不将自己视为隶属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地方教会。南怀仁基金会是一个“蒙福音和梵二精神启发的国际性天主教团体”。

南怀仁基金会成员群体汇聚东西方人士：包括教区司铎、传教修会成员、非基督徒信徒以及平信徒。每位成员都基于各自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为基金会的宗旨贡献力量。他们分别在比利时鲁汶和台北的研究中心工作。南怀仁基金会的董事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董事会成员，这对于基金会宗旨的实现而言是必要的。

基金会秉持开放态度，愿与无神论者、不同哲学流派及宗教展开对话。我们致力于在现代世俗化社会中，以平等互敬为基础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手足情谊，共同追求进步与福祉。基金会的核心理念可概括为“求同存异”——即在对话中积极探索与合作伙伴的共识议题，同时对彼此的分歧保持相互尊重。

南怀仁基金会为实现其宗旨，特别制定了三个活动计划：

一、牧灵与社会交流合作计划。

二、学术研究计划。

三、文化交流计划。

在鲁汶，南怀仁基金会下设两个管理机构：

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与天主教鲁汶大学合作，办公场所设于该校校区内。

鲁汶中华书院：也称“鲁汶仁义书苑”，从事研究或参与南怀仁基金会活动的同仁在此成为“普世基督徒手足情谊”团体，共同生活。

在台湾，南怀仁基金尊重并承继台湾牧灵中心 (TPC) 的传统精神和部分项目，其中包括牧灵人员、教理讲授和社会服务人才的各项培训计划。南怀仁基金会希望能加强与辅仁大学的合作，以及台北中华南怀仁文化交流协会的推动，持续深化相关事业的发展。

了解并支持南怀仁基金会的中国计划

南怀仁基金会是以比利时耶稣会的传教士南怀仁而命名的，他是著名天文学家，也是清康熙皇帝的老师。本基金会于 1982 年由圣母圣心会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设立。

南怀仁基金会赞助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以及台北南怀仁研究中心（位于中央大楼八楼）的活动，自 2009 年 5 月 1 号起也赞助鲁汶中国书院。透过这些机构，基金会积极推动中国教会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以及与中国教会的牧灵合作交流。

南怀仁基金会的优先关怀是：与中国教会发展开放性对话交流，积极响应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牧函，以及教宗方济各的对话之路。

帮助中华各地教会最有效之道，在于投入教会人员的培育。因此，本基金会对中国大陆教会牧灵人员（神父、修女、修士、教友）的培训提供奖学金，也邀请神职人员到欧洲、美国或菲律宾的一些学院接受福传方面更专业的培育，他们学成归国后，到各修院及培育机构授课。

联络方式

鲁汶南怀仁研究中心

Tel: +32-16-324350

E-mail: Verbiest.Inst@kuleuven.be

台北南怀仁研究中心

Tel: +886-2-23149631

E-mail: vftaipei@seed.net.tw

courier
懷仁之驛 **Verbiest**

Secretariat:
Theresa.Hao

Vlamingenstraat 1,
3000 Leuven,
teresajianling.ho@fvi.kuleuven.be

Redaction:

Lucia Wong,
Pieter Ackerman, Jeroom Heyndrickx

Cooperateurs:

Marie-Cécile Herbecq, Tom McGuire

Responsible editor:
Verbiest Foundation